

硬实力、软实力与中国话语权的建构

张殿军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300191)

摘 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话语权既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也直接影响到世界文化价值的分配。硬实力和软实力对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说,在物质硬实力主导国际关系格局的时代,强权即真理的话,那在文化软实力作用日益突显的今天,则是真理即强权。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也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世界的未来。面对硝烟弥漫的世界话语权之争,中国要在不断加强自身物质硬实力的同时,大力增强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切实实用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软实力来赢得中国的世界话语权,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形象。

关键词:硬实力;软实力;话语权;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1)07-0060-08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由物质主义中心走向非物质主义中心的时代进程中。话语权和表达范式在世界主导权之争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P305)}物质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在话语权的建构中,其作用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态势。科学地认识这一历史过程,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中国话语权,对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更好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话语权与硬实力

在探讨话语权与硬实力的关系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来解释一下话语与话语权的概念。

1、话语与话语权

按照福柯的观点,所谓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P159)}也就是说,话语就是一种关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沟通“自我”与“他者”的社会性的关系概念。马克思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P81)}它“是连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

收稿日期:2011-06-05

作者简介:张殿军(1968-)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国际政治。

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4](P436)}没有对话者的话语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得到传播。

话语权则是指社会成员就社会公共问题和国际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立场和主张的权利和资格。它主要包括“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和“效果如何”等内容。话语权是一种公民身份的象征,也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拉斐德在起草《人权宣言》时说,“每个人生而享有一些不可转让、不得剥夺的权利,这就是对各种言论的自由表达权。”^{[5](P178)}

2、话语权的硬实力建构

话语权是人生而平等的重要标志。但在政治社会中,由于不同政治集团和利益主体的利益对立,这种理论上的平等话语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常常沦为不同政治集团权力斗争的工具,和获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6](P82)}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私人利益之间,及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迫使国家以超越实际利益的独立形式,通过政治权力的形式对社会进行干涉和约束,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7](P600)}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的产生根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和对抗,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8](P172)}以权利让渡为基础而产生的政治权力本应是权利的保护者,但在阶级社会,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是绝对对立的。因此,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国家,不仅凭借对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家垄断,通过建立包括国家法律在内的各种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而且还利用其掌控的国家权力,采用社会化的灌输、教化方式,千方百计地传播有利于自己的话语,以控制被统治者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不仅如此,遇到反抗自己统治的敌对势力的攻击时,统治者还往往采用极端手段,通过降低言论自由度来遏止不利于己的言论扩散、传播,甚至不惜剥夺挑战或颠覆权力的反对者的人身自由和话语权利。因此,话语决非是中立无私的。正如有学者所说,话语与权力不可分,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还是掌握权力的关键。^{[2](P160)}国家政治统治因话语权的掌控而得以巩固,而话语权也借助国家的政权控制而得以彰显和光大。

国家如此,国际社会也是这样。作为国家关系延伸的国际关系,在当代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当今世界“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一切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力。“凡是有某种利益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3](P81)}因而国家利益关系是国际政治关系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同国内政治一样,国际关系也必然表现为为国家利益而争夺的权力政治关系。“像在所有政治中一样,权力欲也是国家政治中的显要因素,因此,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9](P43)}在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摩根索看来,权力是“人对他人心灵和行动控制的能力”。权力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性权力资源,也可以是无形的非物质性因素。由于国际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加上国家又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面对着残酷的“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生态,国家通常会采用一种“自助”行为,即通过采用“硬实力”,不断增强国家物质实力来进行自我保护,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硬实力”构成了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主要内容。一个国家拥有的“硬实力”的大与小,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该国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但是赤裸裸的利益扩张和掠夺毕竟会遭致其他利益主体的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声讨,所以,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强权国家还常常提出一套蕴含自身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话语体系来粉饰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霸权做法开脱。因此,强权所至之处,也是张扬自己话语,排斥和压制异己话语的历史过程。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认为,话语是可以得到权力操控的。强权国家可以凭借权力,利用其媒体话语权,根据国家利益需要,主观地制造“社会现实”,甚至无端歪曲、捏造事实,以充满武断和片面的态度过滤、封杀对自己不利的言行。也就是说,在强权政治主导下,何者为

真理,何为谬误,皆是强权国家根据自己的价值立场选择事实制造出来的。而那些经济军事硬实力与强权国家存在巨大时代落差的国家的国家形象只能被牢牢地镶嵌在西方构造好的一整套国际话语体系中而被“他者化”了。所以,当今世界“也只有‘关于’弱势文化的话语,但并没有弱势文化‘的’话语。”^{[10](P34)}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曾详细地研究了西方殖民主义是如何通过对东方的“表述”为文化殖民进一步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他认为,西方所以能对东方进行“建构”和“表述”,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占有“权力”,而东方之所以“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是因为东方没有“权力”。他指出,对东方的表述,“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11](P54)}杜亚泉在谈及这一现象时也曾指出:“强有力主义者,一切是非,置之不论,而以兵力与财力之强弱决之,即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之谓。”^{[12](P364)}易言之,话语权实际上是强权国家经济、军事硬实力的一种投射和反映,从其本质上说,还是一种硬实力。这一事实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论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P81)}拥有强大硬实力的强权国家通过黷武主义,不仅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家利益,而且还凭借强权,把自己的主观意志披上“客观”、“真理”和“正确”的外衣,强行将他者纳入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建构了一个最符合其利益需要的国际关系秩序。

总之,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生态下,话语权在世界上的地位主要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硬实力的分配。硬实力的差序结构造就了话语权的差序格局。从欧洲基督教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到近代的大英帝国,再到现代的美国,无不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诚如亨廷顿所分析的那样:“西方赢得世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思想、价值观或宗教有优越性,相反,是它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个事实:非西方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13]

在以硬实力为坚强后盾的强权政治逻辑支配下,“人人都有发言权”往往会蜕变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因而严重侵犯和践踏了基本人权与自由,是现代国际道义和话语伦理所不容的非文明行为。这是因为,“言论自由是以个人对他的思想,对他的良心的义务为基础的。它是一项道德的权利。”^{[14](P114)}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都应以不损害他国的正当话语权益为根本前提。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往那种依靠物质主义来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强权政治做法已经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实。这是由于当今国际政治“不仅以传统的政治压力和武力方法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人心的斗争。”^{[9](P115)}因此,寻求新的话语权力建构资源,以使它建立在人们之间自觉自愿的认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之上,已成为后物质主义时代世界各国建构国际话语权,争夺国际关系主导权的当务之急。

二、话语权与软实力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降临,使得文化软实力逐步取代经济军事硬实力而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文化软实力激烈博弈的时代。如果说,在经济军事主导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的时期,强权即真理,没有强权就有话语权的话,那么在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作用日益凸显的今天,则是真理即强权,谁掌握了先进文化,掌握了文化真理,谁也就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

话语或语言与文化是唇齿相依的有机整体。美国语言学家 Claire Kramsch 曾说:“语言表述着、承载着,也象征着文化现实,两者不可分。”^[15]话语是民族记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的重要载体。一旦破坏、丧失,文化也就失去生命,不复存在。因此语言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16](P64-65)]确立民族话语权,是保证民族文化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话语还是不同文化沟通、互动的动力。文化最初是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的。因此,世界不同的文化要进行交流,也离不开以话语传播。话语是不同文化发生横向互动的重要平台。不同文化因话语的交流而得以相识、相较。所以,没有话语,就没有文化交往,也就谈不上话语权。话语权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产生的。

正如民族学家和文化学家经常所说的“语言就是文化”。但事实上语言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话语或语言只是纷繁复杂的文化大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文化软实力对话语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首先,话语的本质是文化。人类的存在基础是社会实践。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文化结晶,也创造出来了进行文化交流的语言。对此,马克思就曾说过:“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P98)]因而话语必然要反映该民族国家的文化成果。文化不仅指导着社会成员对社会实践问题的主要思维活动和表达方式,还规定着话语表达的价值取向和意义。作为不同民族、国家经过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外化形式,话语是该国文化成就的重要指标。文化是话语或语言的重要资源和宝库,语言则折射着、反映着文化,是思维和思想文化的直接呈现。有学者分析:“语言的特征是由思想与语音的结合方式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特征与精神相仿,精神在语言中生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语言……语言的特征是民族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17](P199-200)]

其次,文化影响甚至决定着话语主体的背景和素养。话语是通过话语主体来表达的。文化是人创造的。但同时“人化”了的文化也在不断地模刻着人。约翰·P·洛弗尔指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18](P3)]文化是特定民族、国家历史凝结而成的稳定的社会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力量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制约着人的言行举止。不同的文化背景不但塑造了截然不同的话语主体,也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特点。另一方面,文化素养决定着话语主体的语言驾驭能力。话语的驾驭运用能力、话语艺术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话语权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一个拥有广博文化水平的人,能够将文化意含以优美的语言加以表述,而且还能根据他人的文化接受心理和特定精神需求,以幽默、风趣的传播技巧,用他人耳熟能详的语言,在将自己语言蕴涵的意义清楚、完整地传达于文化受者的过程中,能够为其提供无限的文化想象空间,使其在不经意间受到感染。显然,话语应用能力与话语传播主体的文化素养和受教育程度是分不开的。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交流的话语主体已突破了过往单一的国家主体,人人都成为话语交流的使者,因而作为一个国家话语的承载者的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国家话语权的争夺者,其言行举止都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整个的话语权和国家形象。文化素养不仅影响着话语主体,也再造文化受体。通过文化的教育,提高话语主体的文化素质以适应话语权争夺对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家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话语权的权威性、作用范围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话语权是在不同文化主体的较量中产生的。话语权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不同文化的自由选择中通过舆论引导力量改变他人的“价值偏好”。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文化并存的世界,也是多种话语相互较量的过程。不同的文化主体在话语博弈中之所以产生不同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吸

引力、感染力是不同的,因而被认同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凡国际主流话语,其中必然内含着一套能够为不同文化所能共享,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精神愉悦和审美需要的、有着极强的逻辑论证、科学依据和说服力的文化蕴涵和价值。换言之,主流话语的权力和权威性,与无形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正如奈所言:“软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19](P25)}“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等。”^{[20](P153)}换言之,文化的先进与否,决定着话语权力的大小。一个没有足够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做支撑的国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是很难有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如果说,过去话语权是依靠经济、军事硬权力,通过暴力手段以强制方式就可实现的话,今天的话语权更多将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和真理性,是在先进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浸染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中,通过文化受体的自觉认同而产生的。只要话语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即便硬实力不够强大,也会拥有众多的文化追随者和“粉丝”;反之,如果所表述的话题毫无文化新意,即使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硬实力,也会遭遇门庭冷落。中国之所以在汉唐时期曾呈现出四夷归服、八方来朝的盛世境遇,是因为当时的唐朝对于周边的邻国而言,“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汉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21](P8)}同样,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建立,也正像奈所分析的那样,是由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22](P17)}

话语权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和真理性,我们不难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何在实行文化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过程中,都会打着“普世价值”、“全球话语”的幌子,作为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改变权力关系的手段。这是因为,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政治文化理念比其他软实力资源更有亲和力与说服力。诚如奈所说:“我国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有助于促进民主价值观,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人权和民主的信念又帮助增强了我们的软实力。”^{[22](P165)}

综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话语权之争,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力,而非这个国家文化历史的长短和国土面积的大小。正如好的思想内容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一样,话语权在当代也必须以文化的先进性和真理性为内容依托。正如罗尔斯所言:“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3](P30)}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决定了话语权的“有”、“无”和作用范围的大小。可以说,文化有深度,话语权才有力度。话语技巧再高超,如果没有高质量、高品质的文化内容,话语权也就失去了强有力的战略依托和恒久的生命力。

三、发展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进取,已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世界战略性力量,并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更多地是来自于中国硬力量的发展壮大,而非当前为国际社会所激烈争夺的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要素。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与中国在经济等硬实力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还很不相称,存在明显的落差。在国内,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西方的,中国的文化中大量充斥着西方的话语,以至于患上了西方话语的“依恋症”。“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24]国际上,在国际文化交流格局中,中国也不具备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话语权,与中国经贸的巨大顺差相比,

中国的文化贸易长期存在严重的“文化赤字”。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就此撰文承认：“中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也是进多出少。我们对世界文化的影响还很小。”^[25]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的话语主动权,从而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丑化”、“妖魔化”,减少和平发展的文化阻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继续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加强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同时,必须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新时期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切入点,切实用独特魅力和亲和力的文化软实力来赢得中国的世界话语权。

第一 提高文化创新自觉性,占领文化发展战略“制高点”

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26]为此,必须不断提高文化创新意识和实践自觉性。创新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文化竞争长久制胜的不二法宝。今日中国在国际文化关系格局中之所以处于文化弱势者的地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文化创新能力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缺乏创新能力,我们不得不在文化交流中,跟在他人后面不断地生吞活剥一些概念,低水平地“山寨”、“克隆”人家的一些文化剩餐,充当西方话语的“二道贩子”。文化创新力,从短期说,影响到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从长期看,关涉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当今世界能否成为文武兼备,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俱全,并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强大国家,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

在当前,要提高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一是必须提高文化批评意识,培养当下中国特色的文化批评话语体系。文化批评是文化进步的前提。没有文化批评,就不会有文化创新,更没有社会进步。因此批评的力量就是创新的力量,就是话语权的力量。任何一种文化,哪怕是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也只是特定民族、国家特定时空的产物,决非无懈可击。因此,创新文化,保持文化先进性,必要的文化批评是不可缺失的。只有大力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批评体系,才能突破传统和既往,摆脱对“洋”文化的习惯性依赖,真正实现文化创新。二是要在“古”人和“洋”人未曾涉足、开垦的文化“荒原”上不断开拓,大力增强文化原创能力。为此,必须着眼于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要紧密跟踪世界文化发展前沿。这是中国文化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中国只有不断提高对原创文化的创新能力,才能不断丰富中国文化内涵、拓展中国文化样式,也才能使中国摆脱文化弱势者的地位和形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不致沦为一种“乌托邦”幻想。

第二 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取长补短

中国要在西方国家主导的话语霸权体系下,赢得战略主动,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相比较的战略优势,既要扬长避短,又要取长补短。具体说来:一是大力培育民族文化自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根基。世界文明发展史再三证明,一个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对本国文化要持一种“温情和敬意”。西方话语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而本国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文化认同”。独立、自信、自尊的文化意识应该是发展中国文化的基石和前提。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拥有着西方文化所无可比拟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一路前行。如相比于西方社会崇尚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喜好征服的霸道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始终强调和为贵、强调“天下为公”,反对“霸道”,力主“王道”,“止于至善”等思想,对于医治百病缠身的国际社会,建设和谐世界来说无疑更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要在全球文化传播格局中赢得主动权,充分发挥中

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话语权争夺战中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一环。二是要大力发展政治文化建设。中西文化不同,特别是政治文化不同是引发当今中国和西方国家对立、斗争的根本诱因。可以说,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每次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话语攻防大战都是围绕政治文化而进行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政治文化理念,成为中美等国家煎不断、理还乱的政治话题,始终困扰着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现代政治,以现代政治文化为其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提。政治文化发展、培育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掌控有着最直接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能否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是看有没有一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政治文化能否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对世界各国的感召力。^{[27](P18-19)}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固然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文化为其发展目标,但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都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断地交流、融通中实现自我发展和进步的。文化封闭只能导致文化的落后和危机。中国政治文化在以开放的文化态度,广泛借鉴、吸纳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我所用的同时,还必须以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为政治文化建构的出发点,结合时代发展与人民精神文化的要求,努力构建具有“跨越歧见的最大公约数”^[28]的普世性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只有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灵活性,让自己的政治文化具有感召力、吸引力,才能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认同;才能打破西方政治文化对我国文化的解构、冲击,改变在与西方话语文化的争斗中被动、受制于人的不利境况。

第三 加强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队伍建设

伴随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哲学思潮、文化思想、学术话语也如东去波涛奔涌而至,“构成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方面,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西方理论主导化。”^{[29](P188)}“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部追随西方体系。”^[30]这种现象的发生,应该说,既与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巨大冲击有关,也与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薄弱有着内在关联。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理论阵地,因而也是高质量话语的生产机构和基地。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性,如概念的创新、话语逻辑、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只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赋予。^[3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为党和人民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抵御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势所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正如葛兰西所认为的,必须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尤其是必须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作用。

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既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者,也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现主体和重要体现。在西方的学术话语对中国的社科研究不断形成巨大冲击的社会现实面前,国家要不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的资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通过对优秀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推动中国整体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主动、积极地参加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进程,在坚守学术文化价值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勇于创新,大胆开拓,不断提升中国现代人文与科学文化理性的研究和建设力度,通过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品位高雅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增强感染力、吸引力和世界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巴赫金.周边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5]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7]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 [10](英)汤普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 [12]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13](美)亨廷顿与“失败国家”排名[N].社会科学报,2009-05-28(7).
- [14]西奥多·彼得森.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A].报刊的四种理论[C].新华出版社,1980.
- [15]黄辉.试论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渗透及其途径[J].东岳论丛,2009(4).
- [16](德国)赫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7]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 [18]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 [19](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何小东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 [20](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实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1](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22](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M].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23](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24]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东方丛刊,1995(3).
- [25]赵启正.努力建设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J].新华文摘,2004(11).
- [26]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选)[N].人民日报,2006-11-11(2).
- [27]刘建飞.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 [28]汪涌豪.文化 跨越歧见的最大公约数[N].文汇报,2005-06-09(5).
- [29]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30]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类智库缺陷日渐明显[J].瞭望,2009(1).
- [31]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2010(14).

[责任编辑 狄松]